

山西新时期女性作家 小说创作综论

赵春秀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新时期女性作家 小说创作综论

赵春秀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西新时期女性作家小说创作综论 / 赵春秀著.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203-08463-1

I. ①山… II. ①赵… III. ①妇女文学—小说研究—
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2328号

山西新时期女性作家小说创作综论

著 者: 赵春秀

责任编辑: 吕绘西

装帧设计: 王聚金

出版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eb@163.com 发行部

sxske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eb.com

经销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印者: 山西省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05千字

印 数: 1-500册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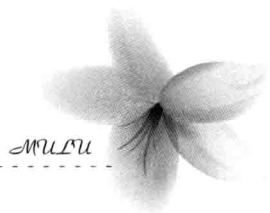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8463-1

定 价: 31.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引论

- 第一节 中国新时期女性小说创作的兴起与发展 001
- 第二节 山西新时期女性小说创作的兴起与发展 014
- 第三节 性别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 025

第二章 蒋韵的小说创作

- 第一节 蒋韵小说创作概述 035
- 第二节 蒋韵作品中的诗意 054
- 第三节 《心爱的树》的文本分析 061

第三章 张雅茜的小说创作

- 第一节 张雅茜小说创作概述 073

第二节	张雅茜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	092
第三节	《此生只为你》的文本解读	099

第四章 陈亚珍的小说创作

第一节	陈亚珍小说创作概述	111
第二节	陈亚珍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	129
第三节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女性观照 ——论陈亚珍《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之女性书写	137

第五章 葛水平的小小说创作

第一节	葛水平小说创作概述	149
第二节	葛水平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	165
第三节	缘于对男权话语的认同 ——葛水平小说女性悲剧探因	175

第六章 小岸的小说创作

第一节	小岸小说创作概述	187
第二节	小岸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197
第三节	烟火人生中的神性之光 ——《水仙花开》的文本解读	206

第七章 结语

第一节	女性作家小说创作的主要特征	213
第二节	在全国女性文学及山西文学中的位置	222
第三节	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可能	226
后 记		235

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中国新时期女性小说创作的兴起与发展

进入新时期以后，承继五四时期女性作家的自主精神，顺应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新时期的中国文坛在天时地利的机遇下，出现了以自觉表现女性意识、构建女性私密空间、挑战男权文化、书写女性经验为中心的女性作家群，她们的小说正式被命名为女性小说。要了解新时期女性小说创作兴起与发展的轨迹，就要从研究中国女性文学的发生、发展入手。

总体来说，从先秦到清末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由于社会地位的低下和男权文化的挤压，女性写作者寥若晨星，有幸留存的文学作品更是屈指可数。在以男性作家为中心的文学史中，这些作品的分量不足以女性代言。盘点卓文君、蔡文姬、李清照、朱淑真等女性创作者的作品，无论是抒发内心的幽怨、遇人之不淑，还是表达家国情怀，都是在男权文化的遮蔽下，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女性自觉，更没有自觉的女性意识，单从这一点来说就将这些本来就不多的女性创作者的作品限制在男性文学点缀的范畴里。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毕竟慢慢觉醒了，大体来看，这觉醒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萌生期可以从清末民初算起，一直延续到五四后。最早可以追溯到女革命家秋瑾身上，是她率先在《勉女权歌》中喊出“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的女性声音；她创办《中国女报》，宣传反封建专制的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所以说秋瑾是我国倡导女性解放的先驱者。之后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由于启蒙教育的深入，涌现出一大批女性作家。冰心、庐隐、丁玲、萧红、凌叔华、张爱玲、苏青等人，纷纷拿起笔讨伐男权文化中的陈规陋习，借助五四文学新潮，女性第一次“浮出了历史地表”，女性文学第一次产生了较大声势的历史影响。五四新文化思潮中以“人的文学”为宗旨，那一时期的女性文学，高扬反封建的旗帜，在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勇敢反抗封建规范的女性形象。不过，此时女性作家对于女性独立品格的表现尚显不足，许多女性作家，包括冰心在内，女性主体意识并不是很强烈，她们大多是在男权话语范畴之内进行着有限的女性私语。当然也有特例，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梦珂》，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我是我自己的”是真正的女性话语本体。可惜的是，时代风云很快将丁玲纳于“政治话语体制”之内，到死也没能回到最初女性觉醒的原点上来。

公平地讲，这一时期尽管女性作家们的理论还不成熟，写作的经验也还略有欠缺，尤其是对女性解放还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与认识，但这种种都不能阻碍女性揭开帷幕，登上历史舞台。正是在这一时期，女性作家们提出了女性独立自主的主题。虽然女性文学的发展之路并未就此走上康庄大道，但这不能归咎于女性作家们的眼界，而是在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中，中国社会动荡的现实迫使女性文学向政治主题聚拢。

第二个阶段是女性意识的缓滞期。在这一时期，相对于男性作家，中国当代女性作家的写作要面临双重阻遏，既要与男性争取话语权，还

必须遵循历史的要求，她们需要同时突破家和国双重的藩篱，才能获得人性的成长和生命的经验。她们话语的生成过程较之于西方女性，要复杂得多，也曲折得多。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号召下，从来就是围着锅台转的妇女们离开锅台，走出家门，投身于社会，开始扮演社会角色，参与工作和各种社会活动，但是这种因外界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社会角色的再认同，并不意味着妇女们的性别意识达到了自主自觉的程度。在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中，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氛围下，为避免“政治觉悟落后”，女性作家的性别意识只能暂时隐蔽起来。这一时期，不仅女性作家的声音被掩盖，男性作家的自主意识也处于逐步丧失的过程中。这是中国文学曾经历的一个过程，也是促使女性解放的同时，又以女性自身的特性被遮蔽的一个特殊时代。这一时期，女性意识的发展曾遭遇过连带性的打击。

“十七年”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人道主义的持续批判，使得“做独立的人”成为一个禁忌，这些因素直接限制了女性意识觉醒的脚步。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近年来，一些评论者开始重新评价“十七年”时期以及其他一些曾被认定为文艺发展阻力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在历史长河中的作用。譬如“十七年”时期在女性文学发展史上，是否真的全无正面意义？社会的解放程度影响着政治经济的发展，而政治经济的发展又直接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教育状况等。也就是说，国家的政治、经济为女性解放提供着前提，或者说是背景条件，我们不能忽视社会解放对女性解放所起的作用。这样看来，为社会解放所努力的一切阶段，无论坦途还是弯路，对于女性意识来说，都不会仅仅是阻碍作用。

女性意识的发展壮大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第三个阶段，是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与新启蒙思潮同步开始的。

新启蒙主义是承继五四启蒙传统，从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与反思开始的。文学上的启蒙精神，其使命在于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终极意

义，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理性主义倾向与终极关怀的性质。不过，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是救亡的时代主题与立人的启蒙任务二者兼顾的，形而上层面上的人性探讨受到过多的政治救亡任务的干扰，纯粹的人文主义追求难有立足之地。时间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民族危亡问题退居其次，文化、人性层面的问题发展成为启蒙主义思潮回归与嬗变的首要主题。又恰逢一场大的动荡刚刚过去，人们认识到“十年浩劫对于人的权利、人的需要、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才能、人的思想、人的感情、人的幸福、人的生命的践踏和虐杀”，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重新呼唤人道主义的回归，希望把人当作真正的“人”来看，重新去评判“人的价值”，这种认识很快便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新时期文学自此呼唤人性的复归，呼唤人性的尊严。这也成为当时的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共同建构的主题。正如张抗抗所说：“人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男人和女人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和精神的危机。”^①“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戕害的，不是单独性别意义上的男人或女人，而是人性意义上的“人”。正因如此，刘心武、王蒙、戴厚英、宗璞都纷纷发文，呼吁“人应该是世界的主人”，作品中要写“人性、人情、人道主义”，“每一个人，都应该像一个人一样，活在人的世界”。女性意识也随着人性解放的观念渐渐深入人心，女性作家们随着对“人”的问题的关注，继而延伸至对女性作为“人”的认识与尊重，“女人也是人”的全新认识直接开创了女性意识觉醒的新阶段。

这个时期，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开始引入中国。此时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虽然未能影响中国社会掀起同样的运动，但随之而来的大量西方女权理论的翻译引进，无疑促进了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20世纪80年代初，朱虹编选《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和《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对西方的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的代表作进行了初步的介绍。1988年，江苏人民

^①张抗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J].文艺评论,1986(4):58-59.

出版社出版了由巫漪云、丁兆敏、林无畏翻译的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这部著名的女权主义著作，猛烈抨击由父权社会男性编造的“女性神话”：女人的最高价值和唯一使命是完善她们自身的女性特征，而这些必须依赖于男人主宰一切、女人在性方面温顺服从并对孩子充满母爱。书中指出，女性要想与男人真正地平等，需进行另一场更根本的、更全面的革命。1989年2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由王还翻译的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伍尔芙认为，女性只有经济独立才能获得创作自由和人身自由。这些文章拓宽了中国女性作家的视域，让大家对女性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进入20世纪90年代，理论界译介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中国文学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王逢振等主编的《最新西方文论选》，林建法、赵拓翻译的《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还有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一步步为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理论渗透进文学界后，对女性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帮助当代女性作家对男权文化、男权意识从感性的反抗走向了理性的解构，并在重新认识女性解放积极意义的基础上，尝试重新定义女性主体本质。

伴随着新启蒙思潮，又有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支持，再加上中国社会整体的社会转型，这一时期，女性作家的性别意识真正成长壮大起来。渐渐地，女性文学的文化主题已经不是“人的自觉”，而发展为真正的“女人的自觉”，女性书写对男权文化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有影响力的女性作家不断涌现，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洁、王安忆、铁凝、张抗抗、毕淑敏、方方、池莉等作家适逢新的时代，社会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经济政策也在强化着妇女地位的提升，这些接受了新思想的女性作家们，突破传统意识的禁锢，思考着人性、女性存在、男女平等问题，将女性意识进一步推进到人们的深层观念中。刘思谦曾准确概括过这一心路历程：“我身为女

人，就从来不知道女人是什么，先是陶醉在半是真实半是虚妄的‘男女平等’的神话之中，后来又学会了‘我是人’这样一个空洞的抽象聊以自慰。只有当各种名目的‘角色’以它们那实实在在的重量向我纷纷挤压而来，我才深深意识到了我那和男人不一样的性别。然而此时‘女人’之于我，也不过是一些‘角色’的碎片而已。碎片下面，依然是一片混沌莫名，难以言说。”^①这正是父权文明话语机制下女性迷茫混沌找不到属于自己话语书写的写照，这段话反映出当代女性文学所走过的艰难旅程。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渐成气候。同时，解构男权文化，确立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建构女性主体性自我的价值取向也逐渐形成。

要建立真正的女性话语，从女性的性别视角出发，表现女性的个体生存经验和生命体验，在女性理论尚未完备、思想观念稍显落后的时代，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西方女性主义对中国女性文学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作家们在创作中敢于大胆展示最为隐秘的女性主观内心世界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女性小说中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女性意识注重女性作为人的价值，倡导人性解放，呼唤大写的人，追求理想的爱情，散发着理想主义的气息。在以往的文学中，严苛的封建礼教将女性的身心禁锢起来，使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找不到抒发的渠道，即使有个别男性创作涉及了女性心理，也是男性眼中的闺怨情思居多。女性从未获得书写自身的权利，她们只能以“被看”的“客体身份”存在于文学作品中。新时期女性文学打破了这种男性视角主观的猜测与想象，以女性自己的视角大胆展示最为隐秘的女性主观内心世界，抒写女性的情感体验，把之前那个不谈情的年代里渐被遗忘的情感世界寻找了回来。

女性意识的复苏给予了女性理直气壮地争取爱的权利的勇气，爱情无疑是压抑已久的人性对自然属性最关切、最急切的关注内容。张洁的

^①谢玉娥编.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19.

《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抗抗的《北极光》等，较早地进入女性隐秘世界，大胆诉说女性对理想爱情的执着与憧憬。《爱，是不能忘记的》提出了爱情与婚姻的关系问题，这是张洁对女性命运关注与思考的开端。小说中两代女性对爱情相同的执着，意味着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而她们对待爱情时不同态度的对比，又表现出女性思想的进步和女性意识的发展。张抗抗的《爱的权利》《北极光》等一系列作品都在呼唤个性解放、尊重人格、追求理想爱情等，其本质就是在追求男女地位的真正平等，可以平等地拥有包括爱情在内的一切人性的自由。

但光是拥有爱情是不够的，女性与男性真正的平等还要兼顾到作为自然性别的人的价值。因此，女性作家们借由表达爱情表达着对于自由、对于独立人格的追求。她们已经渐渐认识到，女性解放不仅要靠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争取来获得，更重要的是要实现自身价值。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关注女性真实生存状况成为这一时期女性意识的重要主题。女性小说由讴歌爱情转向探寻女性自身的价值。这一时期，王安忆、铁凝有很多作品都表现了女性成长的艰难，细腻刻画了女性内心深处的痛楚，同时探讨了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刻社会、历史背景，将问题拓展到了政治、文化领域。

很明显，相对于五四时期的女性，新时期女性作家们更多了一份思索。新时期女性文学在一开始与五四时期女性文学就有所不同，虽然此时期的女性与五四时期的女性有着相似的人生体验，即传统角色与现代人生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压抑感、不平衡感，如张辛欣的《最后的停泊地》、方方的《在劫难逃》等作品都涉及了女性这样的情感焦虑。但表现更为明显的是两阶段的不同：五四时期女性文学侧重于宣泄女人的欲望和情感的焦虑，而新时期女性文学的侧重点则是对人性的赞美、对理性的召唤以及对女性独特情感与社会地位的再确认。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喻杉的《女大学生的宿舍》、张抗抗的《爱的权利》、王安忆的《金灿灿的落叶》等，这些作品出现在那场浩劫结

束的时候，引起了一定的社会轰动，这些作品相对于之前那个阶段来说，比较深刻的人性内容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尽管还有好多问题尚未厘清，但历史已经教会她们追求人生的真正价值。不过这些作品在表现女性意识方面其实还远远不够，其倡导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主题，是顺应当时的文学主题和主流倾向的，距离完全摆脱男性话语控制，构建女性自己的话语体系，还相当遥远。迷茫中的女人们仍然无意识地把男人的标准当作自己的标准，仍然尽力在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表现女性，主题也力求高远，男性文学风格的痕迹依然明显地存在于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中。

真正的女性文学时代的到来要等到铁凝的《玫瑰门》和王安忆的“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等作品的问世。《玫瑰门》中，铁凝的叙事突显出鲜明的女性写作特征，深刻地表达了对女性历史际遇和现实困境的诘问。铁凝借助司漪纹的故事，对新时期之始“爱，是不能忘记的”主流叙事表达了她淡淡的否定。尤其有意味的是小说结尾处苏眉女儿额上那枚酷似司漪纹伤疤的“新月”痕迹，仿佛在暗示着女性命运的历史循环。王安忆的“三恋”也以女性意识取胜，对于女性心理的分析与同情，几乎到了繁复的程度，作品以女人的视角、女人的语气、女人的态度立场告诉读者：男人是不可依靠的，女人要自己担负自己的命运。《岗上的世纪》更几乎成了女权主义的宣言书。至此，铁凝和王安忆将女性意识提升到一个自觉的层面。这一女性意识的长足进步与当时的社会大事件分不开。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借此东风，中国女性文学大踏步地进入高潮期。中国女性作家开始更多地借鉴西方，以一种叛逆的姿态出现在文坛，对男权文化进行颠覆与解构。在抨击男性的同时，将身体当作审美对象加以书写，借以强调女性由生理到心理的卓然独立。梳理这一段女性意识的发展，可以发现，女性意识的觉醒走过了从“人”到“女人”，再到充分正视女性身体的“女人”的过程。这有着非同凡响的

意义，标志着女性解放的进一步深入。女性作家们直面道学家的指责，将笔触伸向男权文化的禁区，反抗的极致就是将“性”这一敏感的词语也大胆引入文本。张抗抗曾经指出，“女性文学有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不能忽略或无视女性的性心理”，“假若女作家不能彻底抛弃封建伦理观念残留于意识中的‘性=丑’说，我们便永远无法走出女人在高喊解放的同时又紧闭闺门，追求爱情却否认性爱的怪圈”。王安忆也发表见解认为：“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王安忆的“三恋”和《岗上的世纪》，几乎以一种惊世骇俗的姿态闯入女性文学的视域，她以理智的态度观照着女性的性爱世界。《小城之恋》将女性放置到人性的两难困境中来表现女性生理与文化的矛盾冲突：一方面，出于自然本能渴望男性的身体；另一方面，又因传统观念带来的罪孽感而时时处于精神的炼狱。《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通过对女性性爱心理的书写，表现了女性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岗上的世纪》的主题是对性爱所具有的生命创造力的一种颂扬。女知青起初试图将性作为改变命运的交换条件，却未曾想到这一非道德的因却结出了真挚爱恋的果。《岗上的世纪》揭示了性爱所具有的创造力，男女双方在性爱的过程中重新认识了生命，甚至给了这对男女仿佛重生般的全新自我。在传统观念中，性一直处于被压抑的、被讳言的地位，然而王安忆却将之赋予了净化人性的功能。王安忆认为：“性爱本身就在反映人性。”由此可以看出，女性作家是在尝试从性的角度来表现人性的。

这一时期，同样从性爱角度来揭示人性的还有铁凝，只不过王安忆更注重面对性爱意识本身，作品的重点也在于着重刻画性爱心理，而铁凝则更侧重于表现女性所遭受扭曲的性意识的戕害。《麦秸垛》中，作者第一次直面女性的欲望，却又让此自然的欲望遭遇社会文化、经济等背景的扭曲，从而批判了传统思想对女性的异化影响，对女性的生存境

遇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棉花垛》讲述了抗日战争前后三个农村妇女的故事。年轻时的米子自恃貌美，以肉体作为交换，与男人们进行交易，换取男人们的劳动成果。米子的女儿小臭子深受母亲影响，十岁时就稀里糊涂完成了女人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后来抗日战争开始了，小臭子和女友乔一起上抗日夜校，两人逐渐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乔成为抗日干部，并与国相恋，而小臭子却与汉奸鬼混。故事的结局颇耐人寻味：正义的乔被非正义的日本鬼子轮奸后杀死，而非正义的小臭子被正义的国性占有后杀死。在这相同的被奸杀的结局背后，体现的是男性集团对女性伤害的一致性。无论正义还是非正义，无论统一还是对立，当面对女性时，他们代表的就是毁灭女性、压迫女性的男权，这一结局给中国女性在社会动荡中的命运赋予了宿命般的悲剧，暴露的正是男权文化的残暴。

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性爱是女性作家关注女性命运、女性心理的一个切入点。王安忆和铁凝都将性心理和性欲望归为女性的自然属性，在冷静客观地探讨时，既顾及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也顾及生命自然的属性，但她们的落脚点依然是对抗社会伦理规范，对手依然是世俗环境，这就没有从本质上与新时期初期借讴歌爱情而探讨人性的张洁等人区别开来，她们都选择了由内向外的观照点。

真正将视点转向女性内心意识的是林白与陈染。她们更执着于女性生命的真实，性别写作、个人化写作、抒写女性的个人体验是她们鲜明的特点。她们致力于解构男权文化，驱逐菲勒斯中心主义，她们的作品常常有一种离经叛道的意味，会重点展现敏感而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女性丰富的内心感受，如孤单、寂寞、死亡、欲望、自恋、同性恋等，这种完全站在远离男权文化宏大叙事特点的女性立场，是她们迥别于之前女性作家的突出特征。林白曾经说过：“我的写作是从一个女性个体生命的感觉、心灵出发，写个人对于世界的感受，寻找与世界的对立。”正是出于这种思想，林白、陈染不会依靠戏剧化的外在冲突来展现人物

的内心，而是将笔触停留在捕捉女性心灵运动的轨迹上，直接展示人物在物欲世界中的复杂感受与灵魂挣扎。她们喜欢使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故事，且赋予作品自传的色彩。事实上，选择这样的叙述策略，其目的并非要让读者相信这是她们亲身经历的故事，而是要强调这些故事都是女性个性化的个体经验。《一个人的战争》中，林白通过多米的人生路表明性在女性生命中的重要地位。陈染的《私人生活》也表明了类似重点。解构男权文化是林白与陈染作品的另一个重点。在女性文学中，父亲形象一直是男权文化的象征，对抗男权，就要摒弃父权，这是女性作家们实现对男权文化批判和解构的一个常用策略。林白在《致命的飞翔》中，对男权反叛甚至到了一种恐怖的程度。美丽优雅的北诺感到男权的压迫时，采用了毁灭式的抗争，杀死秃头男人，就等于象征性地杀死了压迫女性的男权。陈染的作品中也有一种对父亲依恋又惧怕的复杂情感，其复杂性在女性心灵的投射，甚至构成了心理障碍。当林白、陈染笔下的女性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对男性的失望、抗拒时，她们不约而同选择了姐妹情谊、同性之恋来救赎自己。这构成了林白、陈染作品的第三个重点。陈染在《超越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中曾说过：“我的想法是：真正的爱超越于性别之上……有时同性比异性更容易构成理解和默契，顺乎天性，自然而然，就像水理解鱼，空气理解人类一样……人类有权利按自身的心理倾向和构造来选择自己的爱情，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东西！异性爱霸权地位将崩溃，从废墟上将升起超性别意识。”这惊世骇俗的宣言，表明了陈染将女性自救的途径选择为同性之恋。与陈染相比，林白就没有这么大胆，在表现同性之恋时，她自身就一直处于无法摆脱的矛盾冲突中：既依恋同性的身体，又不齿于这种违反传统伦理道德的欲望。其实面对这些惊世骇俗的女性小说，读者或批评者也有些猝不及防，缺少提前的心理建设，因而担忧、疑惧、批评、责难，种种声音蜂拥而上，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写作潮流都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创作潮流之一。